

国学新读本

近思录

路新生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国学新读本

近思录

路新生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思录/路新生注说.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11

(国学新读本)

ISBN 978-7-5649-2615-1

I. ①近… II. ①路… III. ①理学—中国—南宋
②《近思录》—注释 IV. ①B244.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9061 号

责任编辑 薛建立

责任校对 柴桂玲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76 千字

定 价 4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新读本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马小泉

主 编 李振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健 朱绍侯 刘小敏

李中华 李振宏 苏凤捷 何晓明

张云鹏 张富祥 宋会群 杨天宇

杨寄林 杨朝明 赵国华 郑慧生

姜建设 袁喜生 曹 峰 曹础基

曾振宇 戚良德 龚留柱 熊铁基

序

最近一些年来，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强劲涌动，在文化学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最为传统的国学，却能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概念，产生于近代。从渊源上讲，“国学”概念的产生，与“国粹”有些关联，并且是从对抗西学侵入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也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却会有“国学热”的产生，乍一看来，确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实际上，国学的当代走红，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一定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也日益强烈。于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严峻地提到了国人的面前。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它从何而来，要走向何方，如何对之进行价值重估，一切关心文化问题、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们，无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无法理解和接受，对现代经济发展对传

统道德的衰渎强烈抗议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向传统文化复归而倡导国学的呼声。总之，不论是出于积极的思考，还是抱着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对国学的重视则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一种普遍的文化选择。

于是，对待“国学热”就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牢固的根基，是其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摒弃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幼稚可笑的，不可取的。但一遇到问题就求助于传统，甚至一味狂热地提倡向传统复归，也是走不通的，过去那句常说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却也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读经热，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国学，毕竟是一种学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分析批判能力，才能对之进行识读、鉴别而决定其取舍。所以，严格地说，对于国学，尤其是经学，在当代中国，需要的是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批判继承，而不是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采取唱诗班的方式，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无分析地灌输。因此，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为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为着对社会上盲目崇尚读经的风气有所引导，我们组织了这套“国学新读本”丛书，选择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对之进行简明扼要的注释，然后在读本前边，用较大篇幅解读该典籍的基本思想文化内涵，评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如何阅读该典籍做出读书方法上的引导。通过这样一个较为翔实的导读内容，以批判分析的态度，给青年人的国学典籍阅读提供一个健康的思想导向。根据这样的宗旨，这套丛书，在大的结构上，每本都分为“通说”和“简注”两个部分，“通说”是导读的性质，“简注”在于疏通文字，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为青年朋友和一般社会读者

提供一个国学入门的向导。果能如此,也就实现了撰著者和出版者的愿望。

国学所以是国学,就在于它是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这些国学典籍中,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衷心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精华、体认民族精神、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李振宏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李振宏 (1)
《近思录》通说	(1)
一 《近思录》的编纂及内在结构	(2)
二 《近思录》与鹅湖之会	(27)
三 “主敬”与“主静”:《近思录》中的理欲观	(78)
四 关于《近思录》中的“辟二氏”	(101)
五 历史的嬗变:《近思录》学术地位的提升与 定格	(106)
六 《近思录》阅读要点	(116)
七 校注说明	(126)
《近思录》简注	(127)
《序》	(127)
卷一 道体(凡五十一条)	(129)
卷二 为学大要(凡百十一条)	(148)
卷三 格物穷理(凡七十八条)	(184)
卷四 存养(凡七十条)	(210)

卷五	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凡四十一条)	(230)
卷六	齐家之道(凡二十二条)	(243)
卷七	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凡三十九条)	(251)
卷八	治国平天下之道(凡二十五条)	(265)
卷九	制度(凡二十七条)	(277)
卷十	处事之方(凡六十四条)	(290)
卷十一	教学之道(凡二十一条)	(310)
卷十二	改过及人心疵病(凡三十三条)	(317)
卷十三	异端之学(凡十四条)	(326)
卷十四	圣贤气象(凡二十六条)	(334)

《近思录》通说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近思录》是一部重要的典籍。这部著作的编纂者为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朱熹、吕祖谦是好友,学术交往密切。淳熙二年(1175年)夏,吕祖谦赴建阳寒泉精舍与朱熹相会,讲学论道。两人“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①,辑录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语录计 622 条,编成《近思录》14 卷。朱、吕两人只“止旬日”就能够编成《近思录》这一部大书,这却并不是说朱熹与吕祖谦原先没有读过四子的著述,在朱熹的“寒泉精舍”中率尔操觚,草草用事,只用了“旬日”便编成了《近思录》。换言之,朱、吕两人之所以“旬日”便能够编成《近思录》,恰恰说明二人原先一定已经熟读过四子书,掌握了四子思想的精华,成竹在胸,两人相聚于寒泉精舍,“温故”而“知新”,“旬日”而已。若缺乏原有的对四子著述及理念的深切理解和本身深厚的理学学养,朱、吕两人是断断编不出体大思精如《近思录》般的理学巨著的。朱熹对这部书赞誉有加,说:“修身导言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又说:“《近思录》好看。”甚至认

^① 朱熹:《近思录序》。

为：“四子（按，即《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① 朱子盛赞《近思录》，原因何在？据陈荣捷先生的研究，《近思录》的主要编纂者是朱熹。^② 当年于《近思录》的语录抉择、卷数次第、体例编排等一系列问题上，朱熹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或许是他“敝帚自珍”而绝不妄自菲薄，以至于如此夸赞《近思录》的原因之一。但朱熹的自誉绝非漫大无根之谈，因为这部著作之伟大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早在《近思录》面世之初该书已在学界流传。该书在儒学发展史上拥有无可取代的地位，确如陈荣捷先生所说：“《近思录》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以后宋代之《朱子语类》，明代之《性理大全》，与清代之《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均依此书之次序为次序，支配我国士人之精神思想凡五六百年。影响所及，亦操纵韩国与日本思想数百载，且成为官学。”^③

一 《近思录》的编纂及内在结构

（一）四子简介

《近思录》的“作者”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合称“四子”。

周敦颐（1017～1073年），北宋哲学家。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幼年丧父，养于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家，后以荫入仕。历任洪州分宁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一〇五，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② 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第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第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合州判官、虔州通判、广南东路判官、提点广南东路刑狱等，皆有政绩。晚年定居庐山莲花峰下，世称“濂溪先生”。程颢、程颐曾师事之。周氏学术思想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论命题。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易通》，后人编成《周子全书》。

程颢(1032~1085年)，北宋哲学家。字伯淳，河南洛阳伊川人，学者称明道先生。宋仁宗嘉祐进士。曾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等。神宗朝任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与其弟程颐、司马光等反对王安石新政。哲学上，程颢及程颐提出了“天理”范畴，以为理学的最高范畴。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范畴涵括了“道”、“理”、“天”等普遍概念，是关于自然界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以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概括和总结。程颢的主要著作有《定性书》、《识仁篇》等。后人以程颢、程颐兄弟的思想学说大同小异，故合称“二程理学”，他们的学说经南宋哲学家朱熹系统地发挥，形成“程朱理学”。程氏兄弟的著作文章被合编为《二程全书》。

程颐(1033~1107年)，北宋哲学家。字正叔，河南洛阳伊川(今河南洛阳伊川县)人，世称伊川先生，为程颢之胞弟。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1086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幼承家学熏陶，政治上与兄程颢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程颢不但学术思想相近，而且教育思想基本一致，合称“二程”。著作有《周易程氏传》、《遗书》、《易传》、《经说》，被后人辑录为《程颐文集》；明代后期与程颢著述合编为《二程全书》。

张载(1020~1077年)北宋哲学家。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字(今陕西西安)，随父侨寓于凤翔眉县横渠镇(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以后即在横渠镇讲学，人称横渠先生。弟子

多为关中人,后人称他的学派为“关学”。嘉佑二年(1057年)举进士,先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后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等。哲学上,张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提出了“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认为气或太虚是最高实体,道是气化的过程。一切具体事物,都是太虚之气凝聚而成,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形态:“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张载还发挥了儒家传统的仁孝道德观念,并将它同“天人合一”思想结合,提出了调和等级矛盾的兼爱即“既吾同胞,物吾与矣”(《西铭》)的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张载名言。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将其称作“横渠四句”。由于其言简意宏,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著作主要有《正蒙》、《西铭》、《易说》等,此外还有《经学理窟》一书;明代万历年间沈自彰汇编为《张子全书》。

(二) 朱熹和吕祖谦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又号晦翁、遁翁、云谷老人,别称紫阳。祖籍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后徙居建阳考亭(今属福建)。少聪慧而有志,5岁读《孝经》,自题“不若是,非人也”^①。绍兴十八年(1148年),年仅18岁即登进士第。二十一年,铨试及格,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归乡,被差监潭州南岳庙。宋孝宗淳熙间(1174~1189年),历任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等。宋光宗时,历任知漳州、秘阁修撰、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宋宁宗初,升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① 《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第149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庆元二年(1196年),被反对派弹劾,罢出朝,旋归考亭,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州精舍”),从此以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为职志。朱熹曾主持白鹿洞书院、会讲岳麓书院、鹅湖书院等,传道授业数十年,弟子遍布天下,仅宋史记载的就达251人。朱熹早年研习儒家经典,此外,佛教禅学、道经、文学、兵法 etc 亦无不喜好而探究之。拜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后,他专心攻求义理之学,尤重周敦颐、二程、张载。与此同时,朱熹又从佛、老二氏中汲取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并且与传统儒学相互嫁接,终于成为集理学大成的伟大学者。他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研究都有贡献,影响极大,钱穆称之为“言其气魄之远大,议论之高广,组织之圆密,与夫开并时诸贤,皆无以逾乎朱子示之平实浅近”^①、“盖自孔子以来,好古博学,殆无其(朱子)比”^②。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朱学”、“考亭学派”、“程朱学派”或“闽学”。朱熹的主要著述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以及由朱门弟子搜集,经后人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等。庆元六年(1200年)卒,嘉定元年(1208年)谥“文”。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祖籍山东东莱,人称“东莱先生”,后迁河南。宋室南渡,曾祖好问、祖父弼中避难南迁。好问、弼中皆好理学,祖谦幼承庭训,得中原文献之传。年少时东莱“性极偏”,“后因病中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省,遂终身无暴怒”^③。及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又与张栻、朱熹相互友善、相互切磋。隆兴元年(1163年)他进士及第,复中博学

① 钱穆:《国学概论》,第22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钱穆:《国学概论》,第22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宋元学案·东莱学案》,第165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宏词科,任南外宗学教授。六年,任太学博士,召为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淳熙三年(1176年),任秘书郎兼官如故,受命重修《徽宗实录》。五年,升著作郎,命诠释《圣宋文海》,断自中兴以前,孝宗赐名《皇朝文鉴》,计150卷。升直秘阁。六年,以疾主管武夷山冲道观而享祠禄。八年七月卒,归葬武义明招山。嘉定九年(1216年),谥“成”,追封开封伯。

东莱为学主张明理躬行,他治经而尤重视史学,讲实理,育实才,求实用。东莱知识赅博,善取众长,蔚然成为理学大师,当时即与朱熹、张栻齐名,人称“东南三贤”。是时理学内部学派纷争,朱熹主张明理,陆九渊、陆九龄主张明心,然皆讲求心性。东莱兼取各家之长,强调以实用为归。全祖望校补《宋元学案》,对于当年理学内部的纷争不以为然,而伯恭敦厚温良,大器有容,得到了全祖望的首肯,是故独推之,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全祖望并进一步批评朱熹指出:“惜其(伯恭)早卒,晦翁(朱熹)遂日与人苦争,并诋及婺学。”^①说的是伯恭谢世后朱熹曾经出于意气批评婺学,而伯恭正是婺学的开山。下至于清代王懋竑撰《朱熹年谱》,他甚至认为:“朱(熹)、张(栻)、吕(祖谦)三贤,同德同业,未易轩輊。张、吕早卒,未见其止,故集大成者归朱耳。”^②这显然是在为吕祖谦名声不及朱熹而打抱不平了。吕著有《古周易》、《书说》、《吕氏家塾读诗记》、《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详注东莱左氏博议》、《大事记》及《通释》、《解题》、《少仪外传》、《丽泽论说集录》、《历代制度详说》、《周易系辞精义》、《十七史详节》、《东汉精华》等,并编有《宋文鉴》、《古文关键》等。

① 《宋元学案·东莱学案》,第165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王懋竑:《朱熹年谱》,第119~12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朱熹、吕祖谦情谊笃厚，学术交往尤其密切。朱熹建白鹿洞书院，特请吕祖谦撰写《白鹿洞书院记》，成为千古佳文。朱、吕两人又常以书信往来探讨治学心得。朱熹给吕祖谦的信现尚存有百余封，超过其他任何学友。吕祖谦写给朱熹的信保存至今的也多达67封。伯恭凡有撰述，多请朱子批评。如其所著《古周易》、《左传音训》及《东莱易记》、《大事记》等，朱熹均有评论。而朱熹的《论语要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伊洛渊源录》、《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著述初稿撰成后，也都先送吕祖谦请他郢政。朱熹当时早已名声鹊起，是公认有眼力富见地的大学问家和教育家，朱熹却命其子师从吕祖谦，从中更可见朱对吕人格学品的推崇、信任及两人关系之密切。朱、吕二子声气相投、志同道合，有这个基础，才使他们相聚于建阳寒泉精舍“相与读周子、二程、张子之书”时能够产生编纂《近思录》的共鸣。虽说《近思录》编纂的工作主要由朱熹承担，但朱常致函于吕，向他咨询《近思录》的编纂意见，如《四库提要》引《晦庵集》就提到朱熹“乙未八月”、“丙申”、“戊戌”给东莱三书，“皆商榷改定《近思录》”，“灼然可证”《近思录》的面世是朱、吕二子和衷共济一同努力的结晶^①。理学发展史上的这一巨著最终完成于朱、吕二子之手，并非偶然。

（三）“前三子”与二程：《近思录》冶四子于同炉

从学理的角度看，《近思录》的编纂有其学术上的重要起因。

朱子在《近思录·序言》中提到了他和吕祖谦“叹其（四子）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这话透露出一种对于四子之学浑然泯一、同炉共脍的意味。另据《近思录》卷五，其第15条从《程氏遗书》中选引程颢语录，间接引用了邵雍语录，指

^① 《四库提要·子部·儒家类二》，第780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出：“尧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润之物，若将两块玉来相磨，必磨不成。须是得他个粗砺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与小人处，为小人侵陵，则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来。”这段语录复述邵雍之论而不加评论，表明在这一问题上程颢赞同邵雍。《近思录》录用之，那么，《近思录》虽然没有点名引录邵雍，所选的仍然是包括邵雍在内的五子语录。

然而，理学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早、中二期。理学先驱当数周敦颐、邵雍、张载。三子均受到了道教的深刻影响，他们吸收了道家的万物化生论作为“形上”依据，用来与儒学中纲常名教“形下”的“践履性”内容相糅合，研讨宇宙本体，并“推极之于人生之正道”。^①如周子的代表作《太极图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旧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如张载的名篇《正蒙·太和篇》：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

^① 钱穆：《国学概论》，第19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